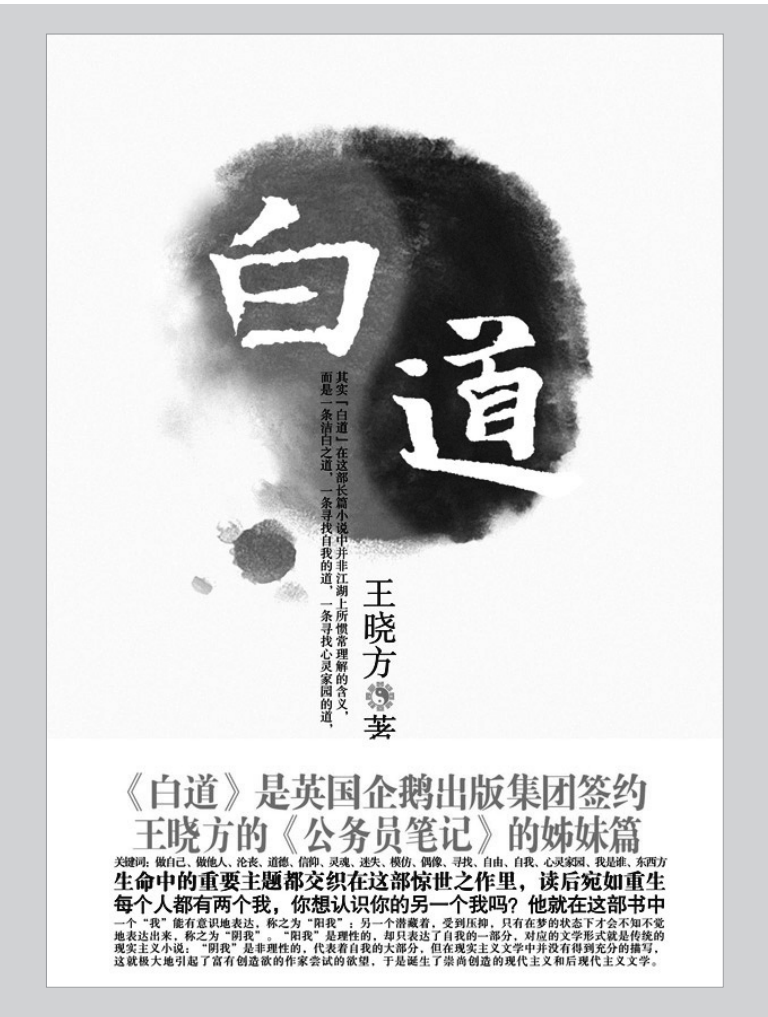


# 《白道》，一次自我思维的突破

——访作家王晓方

□付 容



付 容：如果用“政治文化小说”来界定《白道》这本书，我觉得太普通了，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叙事艺术方面的创新。小说采用了独创的文体，巧妙地运用阴阳两种写法，应该说，这是一种费神费力的创作方法，在结构和文本上的构思，可能花的心血不会比单纯的故事叙述来得少。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把《易经》的精神运用到小说创作中的？

王晓方：在小说形式方面，我始终想找到一种纯中国的模式，于是把目光投向了《易经》。因为《易经》是群经之始，是中华文化、哲学的源头之一。要了解《易经》，必须从阴阳开始。我就想运用阴阳两种写法创作《白道》，当然阴阳两部分的形式既要缘于《易经》，又要有所不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我想到我被《易经》的两个图深深吸引过，一个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图，这个结构刚好契合了我想表达现代人迷失自我、苦苦寻找心灵家园的构思。另一个吸引我的图就是太极图。这张图蕴涵着中国古老的哲学智慧，现代人的梦想、渴望、挣扎、彷徨、痛苦、悲凉、迷茫、苦闷、抑郁、焦灼、浮躁、悲悯、憧憬、追求、希望等等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意识都萦绕在这张图内，太极图根本就是一座阴阳变化的迷宫，而在在我看来，人生就是一座迷宫。小说家的任务就是找到最好的从迷宫中逃脱出去的办法。于是在“阳”的写法中，我采用了太极图的结构。“他”与“我”的开始缘于《白道》，结束也缘于《白道》，刚好是个圆，而“他”与“我”本身就相当于太极图内的阴阳鱼，“他”与“我”的交互叙述刚好契合了阴阳变化。

《白道》不仅采用了“阴阳”两种写法，而且是典型的“元小说”。“阴”的写法是叙述者关于《白道》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是他准备怎么写这部长篇小说的一系列想法，完全是叙述者关于长篇小说《白道》的创作预案，里面的故事不过是叙事者收集和构思的创作素材，真正创作完成的《白道》究竟什么样，我们不知道。这是典型的“元小说”。所谓“元小说”，是一种开放式写作，读者可以看到小说家的创作过程，参与的空间和思考的空间很大。

《白道》创作上的探索在于，让读者了解到小说不是一成不变的大故事，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那种开头、发展、高潮、结尾的单纯封闭式传统写法，无法避免重复和模仿。小说并不是大记叙文，更不是评书。对存在的思考才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什么是存在？就是可能性。对存在的思考就是小说最本体性的特征。《白道》探讨的就是人在命运关头面临的选择，也就是多重可能性。小说家就生活在对可能性的多重想象中。在“阴”的部分，我之所以采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种可以充分表现存在的可能性的结构，就是力图展示我对存在的思考，用人生的可能性和一次性的生命相抗争。正是由于人生在诸多可能性中，才使得小说家成为小说本体的探索者。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正因为如此，寻找才更有意义。在《白道》中，我通过虚构的故事询问世界、寻找自我、寻找心灵家园，在询问和寻找的过程中，我发现生命中悬而未决的时刻，是人生最丰富、最生动的时刻。在这种时刻，小说家可以展开无限的想象空间，对存在进行思考。

付 容：加缪说过“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这一点在《白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应该说，它不是浮光掠影的简单的官场小说。它所呈现的不光是权力角逐下的众生相，也不光是被权力所驱使的一张张或迷茫或扭曲的脸孔，它更注重心灵，更注重灵魂内在的东西。如果说，在小说结构的建构上，您像一位娴熟的魔术师；那在灵魂剖析、哲学思考上，您更像一位犀利的思想家。您是如何把哲学智慧融入到小说中的？您认为思想在小说中应该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王晓方：小说家首先是思想家，当然他的思想一定是通过小说表现出来的，可以说小说与哲学的伟大对话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强调小说的思想性不是要把小说改造成哲学，也不是非要通过小说解决哲学问题，而是因为小说是研究存在的，存在是小说的本体性特征。小说家要想“画出‘存在的图’”，只能通过思想这支笔，而思想与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更何况小说家和哲学家都是心灵的冒险者，每一次思想的创造都是一次心灵的历险，在心灵世界，小说家与哲学家相遇是难以避免的。这也恰恰是科塔萨尔说可以“用小说的形式讲出哲学家们用哲学形而上的方法提出的问题”的底气所在。《白道》是从哲学性的思索开始的。我的意图就是要将小说与哲学结合起来，对交织在生命中的重要主题以小说家的方式进行哲学性的思考。因为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然而很多时候人们似乎只关注经验层面的事物，满足于对现实的“模仿和反映”，以至于逃离真相，逃离本质，放弃作家的历史责任、社会关怀，由于缺乏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因此无法深入到思想、哲学、文化、艺术、美学的层面对心灵世界深入挖掘。文学本身就是人类的心灵家园，并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文学一旦被当作媚俗的手段，写作者的心灵就会被束缚，不自由的心灵怎么可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呢？这就导致许多作品没有灵魂。

正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犹如行尸走肉一样，一部没有灵魂的小说难免走向庸俗、低俗、媚俗。所谓小说的灵魂，就是对存在的思考，小说家是存在的探究者。创造思想，要求小说家对社会要有最起码的独立看法和判断，要勇于深入到灵魂深处表达内心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真实感受。要想把不可表达的、超自然的、不可企及的感受表达出来，就不能去复制、去摹写、去映照现实，而是要独辟蹊径，用非传统甚至反了

传统的方式去构建比现实更为真实、更为深化的存在。因为思想不能模仿，只能创造，在模仿者的头脑里是断然产生不了思想的。加缪说“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这就注定了小说的灵魂缘于思想的创造，而非模仿。

付 容：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是一部关于“寻找自我”的小说。无论是从市委书记秘书位置上跌落下来又被重新启用的市长秘书商政、代市长廖天北，还是文中所指《白道》原型作家郑商，都在“寻找自我”。甚至《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唐朝诗人张若虚您都设计了个桥段，让他为追求自我而摇身变成了江湖郎中。但在这个过程中，又有那么多人在迷失，他们一方面忘却了自身的价值，一方面又盲目地拼命模仿，为自己树立偶像。“寻找自我”是您这部小说创作的精神之核吗？

王晓方：每当我听到关于官员腐败、商人造假新闻时，我就会联想到《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为什么“风月宝鉴”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我经常在心里问自己。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看正面，忌讳看反面。或许这就是一些人道德沦丧、信仰迷失的原因所在。我们往往只看到正面的繁荣，看不到背面的黑暗，比如腐败、官商勾结、造假，而且官员在腐败、商人在造假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羞耻感和罪恶感。造假者甚至将黑手伸向了孩子。值得深思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众多的国家都经历了困苦和磨难，中国的造假成风为什么如此厉害呢？每次惊闻那些触目惊心的罪恶，我脑海中就回荡着鲁迅先生那句振聋发聩的呐喊：救救孩子！我们是崇尚“礼义廉耻”的民族，讲了两千多年的“仁义礼智信”。为什么一个历来标榜讲诚信、讲廉耻、讲天理的民族，在今天却成为诚信度最低的民族之一呢？我们不能不从政治、文化、哲学、历史等元素中去查找原因。善恶虽然在人心，人心却不能判断善恶，这是典型的自我迷失！既然我们迷失了，当务之急就是寻找，寻找自我，寻找心灵家园。我就是带着这些思考开始创作《白道》的。其实“白道”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并非江湖上所惯常理解的含义，而是一条洁白之道，一条寻找自我的道，一条寻找心灵家园的道，一条通向灵魂的道。在这样的道路上，主人公商政和郑商为了迷失的信仰苦苦寻找着。

我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个我：一个能有意识地表达，我称之为“阳我”；另一个潜藏着，受到压抑，只有在梦的状态下才会不知不觉地表达出来，我称之为“阴我”。“阳我”是理性的，却只表达了自己的一部分；“阴我”是非理性的，却代表着自我的大部分。小说家的责任不仅要揭示人的“阴我”，更要揭示一个民族的“阴我”，一个国家的“阴气”。

我认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旦迷失了自我，既做不成自己，也做不成他人，只能在十字路口痛苦地徘徊，这才是《白道》的精神内核。

我的小说之所以被评论家誉为“政治文化小说”或思想小说，我觉得大概源于我的作品既有对政治、社会、历史、哲学、文化等方面的形象化思考，更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思考。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文学是火，意味着她不趋附、不屈从，作家的存在理由便是抗议、反对和批判……文学是一种反抗的反叛形式，不能接受束身的囚衣，任何意在弯折其愤怒和反抗之天性的企图，都注定遭到失败。文学宁可去死，也决不会服从。”我一向认为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是社会的眼睛，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作家是社会的良知。

付 容：小说虽然取名《白道》，但其实“白道”在这部作品中并非江湖上所惯常理解的含义，而是一条洁白之道，一条寻找自我的道，一条寻找心灵家园的道，一条通向灵魂的道。整部小说采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和形式，犹如一座阴阳变化、错综复杂的迷宫，小说情节游离于现实与想象之间，故事叙述也是开放的、多样化的，甚至是虚虚实实扭结在一起的。您是如何在如此庞然的叙事环境中，构建或开辟这一条您所信仰的“洁白之道”的？

王晓方：无论在“阴”中，还是在“阳”中，小说始终通过“他”与“我”两个视角在叙述，“他”代表“他人”，“我”代表“自我”，其实“他”与“我”是一个人，那么“你”在哪里？“你”就是读者。全书由40个短篇和7个中篇拼贴而成，犹如一张精美的拼贴画，完全摧毁了情节的连贯性。同时采用了意识流、象征、夸张、荒诞、梦幻、魔幻、戏仿等手法和表现形式，笔触力争圆润、优美、巧妙、机智，语言追求行云流水的美感，通过多形的句型有效地表现细腻曲折的感情，力争使句子散发出诗与思的艺术魅力。

在“阴”中，主人公商政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一心想做自己，到头来做的却是他人，但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有灵魂的人都是艺术家。什么是灵魂？就是心灵家园！为了找到心灵家园，他毅然决定“走长城”。然而他真的能在这次苦旅中找到答案吗？小说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在“阳”部中，叙述者“我”，也就是作家郑商虽然病得奄奄一息，但医生认为他没有病，这其实是一种隐喻，最后他用死亡呼唤他的影子“小李子”，终于导致那个世俗的我因车祸而死亡，由此艺术的我诞生了。这实际是一个艺术家拯救自己灵魂的故事。《白道》的作者何许人究竟是谁始终是个谜，这恰恰是对“我是谁”的追问。郑商在寻找何许人的过程中，最后回归到了书里，因为“书”代表了人类的精神家园。

付 容：《白道》在您迄今的创作经历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因为整部作品中您不仅在探索当下众生自我迷失的精神困境，而且旨在创造出新的小说形式。它是否具有分水岭的意义？让您对小说的美学探索 and 追求又进了一步？

王晓方：小说家是美的制定者。正如歌德所说，真正的大艺术家制定美，而不是接受现成的美。只有发现美、创造美的人才有权力制定美，那么美是什么？就是发现美、创造美的人的心灵图景。小说家一定是试图告诉读者什么是美的人。当小说家发现自己内心世界的图景时，他的感觉将是痉挛的，没有这种感觉就不是美，这也正是安德烈·布勒东为什么说“美将是痉挛的，否则就没有美”的原因。那么怎样才能表现出、描绘出这种心灵图景呢？还是两个字：创造。由于小说家创造了一种“新美”，自然就成了这种“新美”的制定者。

衡量一部小说是否优秀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发现了美、创造了美并制定了美，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领域是一个内在的自由精神的领域。纳博科夫说：“小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带给我审美的福祉。”小说是一种形式美、语言美、思想美的综合体，它不是为了说教，而是为了超越美德之外的美学快感而存在的。伟大的小说无不诗意地存在着。小说的终极目标就是审美。优秀小说所创造的“新美”应该是审美者意想不到且看到后心灵受到震撼的，虽然没有想到，但实际上是十分向往的。这才叫美的享受。

在美的创造方面，我始终注意形式与本质的和谐统一，力争做到真实情感的真实传达，进而透过美体现人的本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本质。读《白道》不仅可以欣赏到形式美、语言美、思想美，而且可以欣赏到古典美、现代美和梦幻美、魔幻美。毫无疑问，《白道》是对我自己的思维之狱的一次突围，至于它的意义只能交给时间和读者了。

付 容：因为您曾经的仕途经历，可能很多读者会对您的日常生活比较关注。近几年您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您现在全职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吗？一部作品完成之后，您会给自己一段调整的时间，还是很快着手下一部创作？

王晓方：自从我创作小说那天起，我就生活在小说里，我在小说里生活，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不再害怕孤独，而且享受孤独。我认为孤独是一种境界。对有的人来说，文学是手段，但对我不是，文学是我的心灵家园，是我的信仰，是我的宗教。宗教如何拯救信徒，文学就如何拯救我。艺无止境，我不喜欢在旧作中流连忘返，过去的就过去了，我更关注的是下一部作品，再下一部作品。

在作家张炜的诸多著作中，《午夜来獾》很有特色，这部17万字的文集是张炜2010年海外演讲的汇集。2010年，张炜推出了他的长篇《你在高原》，结束了20多年的马拉松式的漫长书写。由此，生活节奏和情感状态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一年中他频频外出演讲，《午夜来獾》便是这众多即兴演讲的汇总。

《午夜来獾》和张炜的其他作品一样充满诗情和哲蕴，音容恬淡，娓娓道来，文笔清新洗练，诗思灵动轻盈。作为一部演讲文集，《午夜来獾》明显不同于张炜其他作品的细密、环扣，更多的是专题性的感悟、思考，围绕一个个彼此相关但又相对独立的问题和现象生发议论，阐释释微，工于哲思，放于逸趣，呈现发散状，颇有蒸腾气象。文集中既有即兴的诗情感怀，也有长期酝酿、厚积薄发的熟悉洞见，读来妙趣横生，气象万千。

张炜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这不仅是指他自幼对诗歌颇为痴迷，年少时即经常有诗作问世，直至今日仍然孜孜于诗歌创作，乐此不疲。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有着诗性的情怀，洋溢着诗情诗趣，他总是以诗人式的纯真之眼观照世界，感悟人生，他的作品中高扬着诗人式的理想主义情调。诗与思的浑然融汇在张炜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张炜的长篇小说并不像许多小说作家的作品那样格外专注于故事的营构、传奇的渲染，他的小说不以险象环生的情节和精雕细刻的人物取胜，更多的是人生的诗性感怀，是典型的诗小说。作品中洋溢着诗情、诗韵，其中描绘的人生图景也别有一种诗情画意。他的散文风格清淡，气韵清真，宛如中国传统的田园诗和水墨山水。

《午夜来獾》虽是一部演讲集，有着对于天地人生、历史现实的广阔分析，但依然是一部诗意的诗，诗情和哲蕴在此浑然一体，世象与感悟在此水乳交融。文集中的第一篇是作者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文章的名字“午夜来獾”本身就颇可玩味，那只午夜中一次次越过栅栏重温故土的正正是现代人的象征，凸显了现代人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的悲剧性。演讲从午夜来獾生发出浓浓的生态意识、家园之思，引领听众诠释和感悟生命与自然的关系。在香港浸会大学“文学空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他更提醒人们当人的心理空间大大缩小之后，文学形态也会发生质的蜕变。从这些演讲中不难感受到传统的东方智慧，这与高度思辨、术语林立的学者式、专家式的演讲迥然不同。

《午夜来獾》是张炜多年对文学思考的一次集中梳理。展示了张炜对文学的诸多独到心得，时有灵光闪现，充满金属质感。张炜视文学为生命的本能，他深信文学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能否走入和揭示人性中最曲折隐秘的那些部分。“诗”与“真”合成的力量才能抵达人性的深处。

文学离不开万千生命簇拥的自然和大地，张炜对于出于功利考虑和资源忧虑而生的所谓的“环保文学”提出了质疑，对中国当代文学蜕变成了当前物欲世界最庞大的一支伴奏队伍进行了尖锐批判。他更推重的是象孙犁和汪曾祺那样对现实功利性有所超越的作家。在他看来，写诗更多的借助想象，而散文更多的假道描述，这两者一旦很好地结合起来，就成就了好小说。和诗文相比，小说更能涵盖复杂难言的生活经历，使作家的思想和情感最大限度地得到释放。《午夜来獾》里有着许多别开生面的言说。其中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聚焦于小说与动物，回顾了蒲松龄、杰克·伦敦等作

## 走向“诗与真”

□李绪政

阅读《午夜来獾》是如此愉悦而又澄明的感受，虽然也不乏深邃、锋锐的忧思，但总的感觉还是温暖、沉静，充满力量与智慧。仿佛是在与作者促膝而谈，听他用特有的和声安静的语调，用朴素、坦诚的话语，讲述自然、生命、真理、文学这样一些深刻的命题。如果把阅读他的小说比作是在剧场观赏一场华美、超逸的演出，这部新书就更像是与导演在休息时间，在后台席地而坐，或者是在舞台边上随走随谈的一次聊天。虽然表面上看很多是即兴式的讲谈，话题也相当广泛，但其核心与奥义却无一不时指向舞台中央，指向演出的焦点。

无论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还是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抑或是与香港中学生的聚谈；不论是在香港作家联合会演讲，还是接受香港《文汇报》、《凤凰读书网》等媒体的采访，每一篇文章的背后，张炜都在用长年累月寂寞而幸福的写作实践来回答文学的意义、价值、标准等问题，殷切地发出生命的呼召——走向文学、走向“诗与真”。

“爱文学就是仁慈，就是把生命里面最柔软的那个部分拿出来，就是追求完美。这样对于热爱、对于创造，都会加倍有力。哪一个地方热爱文学，哪一个地方的人生活得就有尊严；哪一个地方的人谈路文学和艺术，哪里的工作环境就会冷酷，就会不近情理、没有光彩、没有想象力。一个人不会用诗意的眼光去打量世界，当然也不会为这个世界去创造诗意。”

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喧哗与骚动的时代，真如作者所言，我们“拥有当前物欲世界的最庞大的一支伴奏队伍”，而且是“后来居上”的。在这样的时代，张炜的声音一直都是“警示”、“醒世”的大音希声，他看到了现代人无处可逃的困境，看到了清醒之后的绝望与绝望之后的清醒，看到了极度繁荣、畸形的城市与极度凋敝的乡村，更看到了现实中对美、对智慧的彻底麻木和拒绝，对欲望与放纵的妥协与沉沦，于是他“将举生之力，抵达一个目标”。这样的一种执著与坚守，显得如此珍贵、如此高贵，却又如此素朴，大地一般平安踏实，坦荡无边。

所谓的后现代，就是处处都是“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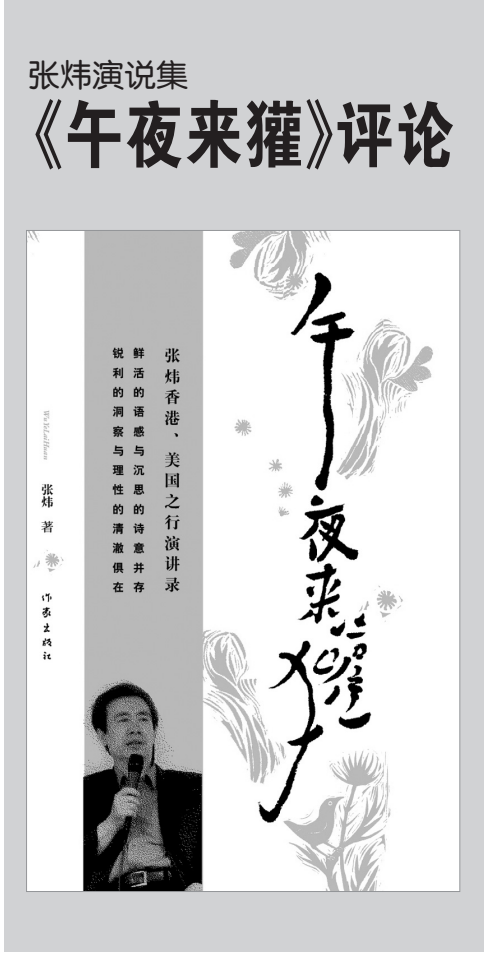
家对动物的传神刻绘，在他看来，这些作家最值得推重的地方恰恰是他们对人性的理解的深度、对社会牵挂的深度，在于他们的善良和博爱，这使他们的文学面貌为之一变。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演讲则对大自然、城市和文学的关系展开畅想，强调文学不是远离日常生活的专业工作，而是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心中相对来说比较柔软的那一部分。哪里有心灵对完美和善良的追求，哪里就充满文学的光辉。这些思考既与中国的抒情文化传统、古典小说美学、民间文艺渊源声息相通，又汲取了现代西方艺术哲学的一些精华，熔铸了现代性文化的成果。

□何志钧

## 诗与思的交响

《午夜来獾》展现的是作者对往古来今、天地人生、人心物欲的感悟、洞察和畅想，对全球与本土、现代与传统的深沉思索，别有一种悲悯情怀。比如作者谈到尺八演奏源自中华，留在异国，和西洋乐器精确的器械之声不同，其韵致更传天籁，这让作者深深惋惜传统的流失，感叹“经过一百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这条强有力的文化河流给阻断了，干涸了。可是又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它已经渗透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底层和民间，总有一天还是会焕发出冲刷的力量”。

《午夜来獾》延续了张炜作品中一贯的现代性反思，张炜并不简单地排斥现代性诉求，但他对现代性文化和物质主义的盛行始终充满警惕，在这部演讲集中，古代齐国的国都临淄出现多达17次，临淄作为古代世界中一个穷奢极侈、欲望泛滥的繁华都市，不断提醒作者警惕声色犬马对文化、人性的毁灭性威胁。《午夜来獾》呈现的是一种介于诗艺与启示之间的状态。海边从林里长大的作者始终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关系无限推崇，他主张现代人仍应以一种自然舒展的方式与自然相处，倾听天籁，读书静思，回应灵魂深处的召唤。如是，则即使身处电视和网络的摇滚中，也可以沉静从容地修葺内心。



也处处都是“碎片”。不论文学还是伦理，似乎任何领域，在连“颠覆”也被颠覆、“解构”也被解构之后，实用、功利或明或暗成了惟一的路标与指向。这样的时刻，作者的话语格外沉甸和振聋发聩。“需要标准，需要准则，需要保守我们最珍贵的一些东西。一句话，我们还是要想相信绝对真理，要有追求这些真理的勇气、坚持的勇气；“我们今天最需要做的，就是拿出成年人的经验和智慧，去勇敢地告诉比我们更年轻的人——这是一种现代责任，也是一种爱。顽强地表述民族传统，贯彻一种时代的保守精神和心中的理想，在这个时期是真正的光荣”。

当然，“一个作家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上，忠实于‘诗与真’，恪守自己的原则，经受各种各样的诱惑和考验，是不容易的”。很多访谈者，都和作者探讨了“为谁而写”的问题，张炜诚实而又坚定地说，是为“在很高的地方、在云端、在远处，注视自己、关心自己的‘另一个我’”，这是他在浩浩荡荡的欲望潮流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反拨的最深刻的内因与动力之一，也是《你在高原》这部凝聚正气的作品得以诞生的基础。

这部演讲集中，作者不但谈了文学、写作、自然、社会、真理等深刻话题，也谈到了媒体、网络、环保等热点话题，更有很有趣的关于獾、狗、喜鹊、树的话题，特别是又胖又大、起飞时像飞机一样助跑的四只雄野鸡，作者谈论时的那种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喜悦、挚爱让人过目难忘。

要更真切、深刻地阅读、感受张炜，读他的小说、散文、诗歌也许还不够，在品味《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你在高原》等作品之外，还要读读这本《午夜来獾》，要听他兄长一般和我们促膝而谈。这是一本智慧之书、温暖之书，宛如辛苦劳作之后，午夜的一碟精美甜点和一杯红酒。